

当代美国外来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

伍 斌

当前在美国社会颇受关注的移民收紧趋势,从表面上看,与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存在一定关联。但其深层的社会原因是自1965年移民法以来,亚洲和拉丁美洲持续地大规模移民后,移民融入美国社会面临结构性困境,美国社会多样性快速发育,政府及社会应对不力,导致社会矛盾突出的表现。移民融入困境具有多重原因,文化上,以亚洲和拉丁美洲为主体的移民文化,由于与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融合缓慢。观念上,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上倡导文化多样性,将之视为一种价值追求,客观上也强化了族群内部的文化认同。经济上,处于美国经济结构两端的外来移民或与母国的跨国关联紧密,或集中居在自己族群的社区,缺乏融入主流的意愿。政治上,由于美国逐渐丧失在全球的绝对优势地位,对移民的担忧与排外思潮复苏,美国社会对移民的包容性降低,在美国主流社会对同质性丧失的担忧、对多样性加剧的恐惧,以及保守主义思潮的回潮和族裔间冲突加剧等复杂情况下,美国政府对移民的控制加强,促发非法移民高潮,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关键词:美国 外来移民 多元文化主义 保守主义 融入困境

作者伍斌,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地址:长春市,邮编130024。

国内外媒体多将近年来美国采取收缩移民的政策,归因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为美国总统,不可否认二者存在一定关联。自特朗普2016年主政以来,移民和族裔问题再次成为美国政治和文化的前沿问题。^①毫无疑问,特朗普代表甚至强化了美国当前政治中复苏和凸显的排外倾向,但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需要联系全球化、美国移民的阶段性发展等背景进行宏观而深入的考察。笔者以为,美国移民问题的趋于紧张,核心根源在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规模持续移民,美国社会快速“同化”(assimilation)^②外来移民能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国视野中的旧金山大地震后中国城重建及其影响研究(1882—1915)”(项目编号:18BSS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动议和法案,包括取消对接纳难民的城市的拨款,挑战美国宪法关于出生公民权的条款,减少移民,尤其是基于家庭亲属链条的移民,收缩甚至暂停发放绿卡,取缔来自恐怖主义国度的难民,严格签证条件,禁止对特定伊斯兰国家的国民发放签证,加强美墨边境隔离墙的建设等。其中后四项已付诸实施。参见 <https://www.cfr.org/interactives/campaign2016/>。

^② “assimilation”在美国移民族裔历史与现实的语境中为“趋同”之意,即彼此接触的两个或多个群体实现同质化。其内涵与层面较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同化”所指更为复杂。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同化”,指一个民族“失去民族特点,变成另一个民族”,其进程分为强迫同化和自然同化两种。鉴于“assimilation”在美国语境下的丰富且多层次的内涵,本文根据行文内涵所指的差异而相应地翻译为“同化”“融入”“融合”“吸收”等。

力的失灵,以及美国社会多样性的进一步发育,导致美国主流社会产生国家同质性日趋不存的担忧,族裔间冲突加剧,美国社会保守主义思潮的复苏。

历史上,美国曾经历至少三次大规模移民,其时移民的融合也遭遇不同程度阻遏。纵观美国历史,移民融合^①进入美国社会的途径可大致归为三种模式:^②一为“融冰模式”。顾名思义,在这一融合模式下,移民悄无声息地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中。由于大部分移民与主流美国人在宗教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种族特性等方面存在较高的一致性,在融合过程中并不对美国主流文化产生实质性影响,犹如冰融入水。这种融合模式总体上颇为顺利,往往为普通民众和学术研究所忽略。美国建国后,来自英国的移民的融入即属这种模式。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阶段,这个看似顺利的融合模式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压倒多数而形成的,其实质上对非英国移民带有排斥性或明显的“强迫融合”色彩。二为“融糖模式”。移民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自身发生了根本改变,同时也对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文化因子部分为美国主流文化所吸纳。这种融合模式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冲击不大,因而融入进程也相对顺利。美国内战前后来自德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移民,其融入历程多可归为此类。这种融合模式因对融合对象较为尊重而带有“强迫融合”与“自然融合”结合的部分特点,属“半强迫融合”。三是“扩散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移民虽生活在美国社会,但基本处于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的状态,很难融入其中,而美国社会则能感知这种冲击,视其为美国社会的“他者”。由于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的边界仍有接触、交叉,虽然彼此并无积极融合的意愿,但被动的融合却在发生作用,犹如物理学的分子扩散一般。这种融合尽管缓慢,其进程却一直持续。以华人为代表的有色种族移民,在美国社会的融入状态,即属于这种模式。当然,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融入经历,更多的是三种融合模式同时发生作用,它们的合力塑造了美国文化与移民的经历。只是对不同的族裔群体而言,其侧重的融合模式也相异。

在美国,有关移民融入主流社会的研究以20世纪20年代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的著作为滥觞,学界对融合概念以及美国历史上移民的融入进程,进行了多层面、深层次的探究。^③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学界关于融合对移民的重要性的怀疑,以及对“9·11”事件之后移民融合“融冰模式”回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美国社会对移民的看法。在

① 美国历史上的移民族裔“融合”理论主要有三种,分别为“盎格鲁归同论”(Anglo-conformity)、“熔炉论”(Melting-Pot)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盎格鲁归同论”强调外来移民无条件融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也即所谓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其进程既有强迫融合,也有自然融合;“熔炉论”意为各族群在美国主流的基础上融为一个新的民族,其进程也包括强迫融合和自然融合;“多元文化主义”则是各族群在平等、正义、尊重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和谐共处,倡导文化多样性,其进程基本为自然融合。参见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84—159。

② 本文所说的移民融合“三种模式”,受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戈登(Milton M. Gordon)所归纳的融合美国移民“三种融合理论”,及亚历杭德罗·卡纳莱斯(Alejandro I. Canales)和伊斯雷尔·阿马斯(Israel Montiel Armas)关于移民融合模式的启发;前者包括“盎格鲁归同论”“熔炉论”与“多元文化主义”,后者包括“融糖模式”“融石模式”“海绵模式”等。参见[美]米尔顿·M·戈登著、马戎译:《美国生活中的同化》,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76—147页;[瑞士]安托万·佩库、荷兰保罗·德·古赫特奈尔编,武云译:《无国界移民:论人口的自由流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231页。

③ 美国学界关于移民族裔融合理论的经典研究包括: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21;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il Sandberg, *Ethnic Identity and Assimilation: The Polish Community*, New York: Praeger, 1973; Richard Alba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全球化背景下,这种看法愈来愈受国际环境的影响。

本文认为1965年后美国以亚洲移民和拉丁美洲移民为主体的外来移民遭遇融入困境。这些融入困境包括:第一,大规模持续外来移民所催生的美国社会多样性的进一步发育,使其融合进程颇似“扩散模式”,举步维艰;第二,多元文化主义对多样性的追求,鼓励移民族群保留自我文化特征,融合的必要性渐失;第三,移民跨国联系的加强及母国对移民的吸引,使移民融合的意愿减弱,融合进程大为延缓;第四,美国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使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受阻。同时,本文亦对导致上述移民融入困境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在学理上认识当前美国移民政策收缩的趋势,及紧张的族裔间关系,解读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谓“美国特性”面临的挑战。^①

一、大规模持续外来移民与美国社会多样性的进一步发育

学界普遍认为,当代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而对这种多样文化源起于何时,则莫衷一是。有学者指出,早在欧洲移民来到之前,北美就已经是一个由在文化、语言、信仰上存在差异的不同印第安人所构成的多样世界。^②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于殖民地时代,由于黑人奴隶制,以及规模不小的德国和法国移民的存在,而使英属北美成为文化多样性突出的社会。^③

以上这些观点各有其道理。不过在笔者看来,或许美国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甚至前殖民地时代,但其成型则应在20世纪初。其理由至少有二:其一,来自东南欧的移民如意大利人、犹太人数量庞大且持续稳定,因受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而固守母国文化,不易融入。其突出的文化特征足可成为美国文化中不容忽视的一员。其二,1924年美国通过《印第安人公民权法》(Indian Citizenship Act),正式全面将印第安人纳入为美国社会的一员,赋予其公民身份;印第安人文化也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而成为美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元。^④可以说,到20世纪初期,美国已成为一个在族裔、种族、信仰,以及语言文化等诸方面多元的社会。但在总体上,美国仍由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主导。

欧洲移民在美国的融合历程相对成功,经过两三代人之后,已基本实现基于“融糖模式”的融合。一方面,来自欧洲的移民在文化与种族上同盎格鲁主流白人总体相近,既相对容易地被美国社会接受,自身也有融入美国社会的强烈意愿。到20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欧洲移民族群及其族裔文化已不再凸显。另一方面,自1924年美国移民限额法颁布后,来自欧洲的移民急剧减少,尤其是东南欧移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⑤19世纪80年代至当时的大规模欧洲移民被中断。这既与美国移民限额政策有关,也受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和第二

①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需要说明的,“解读”亨廷顿,并不代表笔者“认同”亨廷顿,尤其是其“文明冲突论”。

② 参见 Vincent N. Parrillo, *Diversity in America*,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1996, pp. 18—19.

③ 参见 Joe R. Feagin,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89, p. 1.

④ 参见 Indian Citizenship Act of 1924, http://www.nebraskastudies.org/0700/stories/0701_0146.html.

⑤ 从1924年到1925年,美国来自东欧的移民从34,091人急剧下降到4687人,南欧的意大利移民则由56,246人骤降至6203人。相关数据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计算所得。参见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D. C., 1960, pp. 56。

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二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需要大量劳力,自然无剩余劳工移民美国。直到1965年新移民法颁布之前,仅有数项临时移民法颁布,并未对美国总体的移民格局产生太大影响,也未对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主体的美国文化构成实质性挑战。^①而1965年美国移民法,无疑标志着美国移民政策的又一次转折。

美国1965年移民法,废除了自1924年移民法确立的基于国家起源的配额制度,代之以一种移民优先体制,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移民的来源,而是其技能及与美国公民或居民有亲属关系者的家庭团聚。其签证的限额为每年17万。这其中不包括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也未涵盖所谓的“特殊移民”(special immigrants),包括海外的美国前公民、传教士和雇员等。^②

如果说20世纪初是美国文化多样性的成型时期,那么,1965年移民法颁布之后,大规模持续的新移民,则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社会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发育。与过去以欧洲人为主的移民潮相比,新移民主要来自亚洲、拉丁美洲诸国。2010年的人口统计提供了观察美国种族与族裔多样性的直观数据。2000年到2010年,美国总人口从2.814亿增长到3.087亿,增幅为9.7%。相比之下,亚裔美国人(包括有亚裔血统的混血美国人)从1190万增长到1730万,增幅为46%,接近美国总人口增速的5倍;亚裔美国人的增速是所有美国族群中最快的,2000年至2010年美国增加的2730万人口,基本来自非白人种族,其中亚裔占约三分之一。^③可以说,亚裔美国人正逐渐改变美国及美国人的面貌。

拉美移民对美国社会的冲击更大,甚至日益威胁到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在美国社会的主流地位。在2000年到2010年间,拉美裔人口增加了1520万,占2730万总增加人口的一半以上。2000年,美国的拉美裔为3530万,占人口总数的13%,2010年增至505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6%。2000年和2010年间,西班牙裔人口增加了43%;而非西班牙裔人口增加相对缓慢,约为5%。其中,白人的增速尤其缓慢,10年间仅增加1.2%,从1.946亿增加到1.968亿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份额亦从69%下降至64%。^④黑人为3890万人,占总人口的12.6%。不难看出,在美国的主要族群人数同总人口的比率中,黑人基本维持在12%左右,白人则处于持续下降之中,而拉美裔的增速仅次亚裔,但因其基数大,在美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急剧攀升。在所有拉美移民中,尤以比邻的墨西哥移民增长迅速。从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的墨西哥裔人口从2060万增长到3180万,增幅达54%。在同一时间,波多黎各人增长了36%,从340万增加到460万;古巴人口增长了44%,从120万增长到180万。^⑤由于以墨

① 这其中包括《1946年中国战争新娘法》(1946 Chinese War Brides Act)和《1952年移民与国籍法》(1952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都未能在根本上挑战《1924年移民法》确立的移民配额与限制政策。相关美国移民法,参见 <http://library.uwb.edu/Static/USImmigration/USImmigrationlegislation.html>。

② 参见“1965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89th Congress; October 3, 1965; H. R. 2580; Pub. L. 89—236; 79 Stat. 911. http://library.uwb.edu/Static/USImmigration/1965_immigration_and_nationality_act.html; “Census 2000 Briefs and Special Reports,” <https://www.census.gov/population/www/cen2000/briefs/>. 2018年3月21日; Richard Alba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

③ 参见 Elizabeth M. Hoeffel, Sonya Rastogi, Myoung Ouk Kim and Hasan Shahid, “The Asian Population: 2010,” <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data/>。

④ 参见 Karen R. Humes, Nicholas A. Jones and Roberto R. Ramirez, “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2010,” <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data/>。

⑤ 参见 Sharon R. Ennis, Merarys Rios-Vargas and Nora G. Albert,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2010*, <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data/>。

西哥人为主的拉美移民在过去半个世纪持续地增加,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说西班牙语的主要国家之一。

移民在东道国融入受诸多条件的影响,其中,移民规模和移民持续时间的长短,是移民融入顺利与否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形下,移民规模越大,融入的阻力也就愈大。同样,移民持续的时间越长,其融入进程的时间也会拉得越长,反之亦然。如前文所述,1965年以来,以亚洲和拉美移民为代表的大规模移民,在极大丰富美国多元文化的同时,也使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融合压力。

当代美国的外来移民,除了因集中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且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而导致融合受阻外,其自身存在的一些其他特点也影响到他们在美国融合的进程:首先,地域分布相对集中,除传统中心城区的族裔“隔都”(ghetto)外,郊区“隔都”也逐渐出现。移民分散无疑有利于其融合。但1965年以来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则分布相对集中。他们聚集于如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纽约、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诸州的城市中。这种聚集效应使其影响更加凸显,其中加州尤为突出。在20世纪90年代,加州人口增长迅猛,增幅约为10%,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因于拉美裔和亚裔人口的快速增长,其增幅分别达到33%和43%,而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所占比率下降到不足该州总人口的一半。^①2010年,少数族裔占人口多数的州已达五个,除加利福尼亚外,还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夏威夷、新墨西哥和得克萨斯诸州。夏威夷州的少数族裔比例最高,达到77%,其次是加州和新墨西哥州,各占60%。^②他们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由此可见少数族裔群体聚居程度之一斑。尽管上述地区人口结构的变化速度短期内不太可能在美国其他地方大规模复制,但在主要的人口大州和大都市区,非白人和拉丁美洲裔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足以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强大且持续增加的影响力。可以说,当代新移民及其后代迅速地改变着美国都市的面貌,成了不容忽视的存在。移民愈是高度集中,就愈容易形成自成系统、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也就愈难与美国主流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其融合进程自然愈缓慢。在美国,墨西哥移民的种族和文化隔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这一族群遵循之前移民潮的传统融合模式。

其次,新移民在文化上与美国主流社会存在巨大差异。同欧洲相对同种同源的移民对比,来自亚洲与拉丁美洲的移民,无论是种族上还是文化上都与美国主流迥然不同。这直接影响到深层次融合:通婚。在美国历史的相当长时间里,不同种族间的通婚是非法的。直到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反种族通婚这一陈规。反感跨种族通婚是早期美国限制移民的重要动机之一。学界一般都同意,族裔间“通婚”被认为是融合的终极表现。学者们关于这类论述非常之多。例如,唐纳德·鲍格(Donald Bogue)曾言,“两种人在同一个社会的融合程度,取决于他们之间的通婚”。^③彼得·布劳(Peter Blau)也指出,“高的通婚率被认为是社会融合的一种证据”。^④跨族群婚姻既能反映不同族裔间的关系,也能表明不同族裔间的

① 参见 Todd Purdum, *California Census Confirms Whites Are in Minority*,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2001.

② 参见 Karen R. Humes, Nicholas A. Jones and Roberto R. Ramirez, *Overview of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2010*, <https://www.census.gov/2010census/data/>.

③ Donald J. Bogue,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69, p. 358.

④ Peter Blau, Carolyn Becker and Kevin M. Fitzpatrick, "Intersecting Social Affiliations and Inter-marriage," *Social Forces*, Vol. 62, No. 3, 1984.

接受度。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戈登(Milton M. Gordon)也持类似的观点。^① 在1994年,亚裔女性移民一代、二代、三代的异族通婚率分别为18.6%、29.2%、41.5%;拉美裔女性移民一代、二代、三代的异族通婚率分别为8.4%、26.4%、33.2%。后者的异族通婚率不仅在美国当代移民族群中最低,甚至也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南欧移民异族通婚率。^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移民大规模长时间持续及相对聚集外,也与这些移民同美国主流之间存在较大文化差异有关。移民规模不大、居住分散,且文化相近,则更易实现异族通婚;反之,移民规模越大,居住越集中,文化差异越明显,与异族通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最后,在亚洲和拉美移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移民,这种身份尤其不利于融合。以美国的华人非法移民为例,据估计,20世纪90年代初,非法进入美国的华人移民约为10万人,其中约80%是男性,相当一部分隐藏在纽约市的中国城(Chinatown)中。他们多通过偷渡非法进入美国。这一国际人口走私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当时,从中国到美国的秘密运输费用约为每人3万美元,其中800至1000美元的首付款由偷渡移民的家人或当地社区提供。其余的钱必须在他们抵达美国后全额支付,或者以移民收入分期付款的方式偿还。到21世纪初,华人非法入境美国的费用增至超过8万美元。^③ 这些偷渡客承受着沉重的债务,使他们多年遭受无形奴役。即使他们偿还完所有因偷渡欠下的债务,但由于其非法地位,再加上普遍欠缺英语能力,也只能隐匿于中国城中,从而基本阻断了他们与外界美国社会的联系。但与母国的跨国纽带仍通过相对隐蔽的手段进行,如为数不多的电话交谈,以及越来越便捷的网络通信,观看与中国有关的电视节目,消费来自母国的物资等。这些藏匿在中国城的非法华人移民,与美国主流接触的唯一渠道,是散落在中国城为数不多的文化载体,包括语言、报纸、图片、影视频节目、网络、广告,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相关活动。即便如此,这些非法华人也不能或不敢参与其中。^④ 这就将他们的融入进程降至极低的限度。而华裔美国人的民族媒体和文化节日,以及中国城的华人组织,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与归属感。可以说,他们更多的认同母国及美国的华人群体。而以墨西哥非法移民为代表的拉美非法移民,由于距母国距离较近,对母国的认同同样强烈,与母国故土亲朋的联系也更为紧密。^⑤ 对这些非法移民而言,融入美国社会既无可能,亦无必要。这也就意味着,美国传统的移民融合模式如“融冰模式”和“融糖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扩散模式”在美国移民融合进程中越来越占据核心地位。

这些因素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处于彼此强化的互动关联中。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持续的大规模移民,使得其本与美国主流文化颇为相异的文化更为凸显。因为文化相异,数量庞大的移民无法在短时间内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中,这些移民只得聚集而居,而族裔聚居区又为非法移民提供了庇护所。如此诸种因素,导致移民的融入进程更为缓慢,推动了美国社会文化朝多元化方向发展。

① 参见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p. 70.

② 参见 Gregory Rodriguez, *From Newcomers to Americans: Th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into American Society*,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Immigration Forum, 1999, p. 22.

③ 参见 Ewa Morawska,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Assimilation: A Variety of Combinations and the Analytic Strategy it Suggests," in Christian Joppke and Ewa Morawska, eds., *Toward Assimilation and Citizenship: Immigrants in Liberal Nation-Stat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48.

④ 参见 Robert M. Jiobu, *Ethnicity and Assimilation*,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p. 98.

⑤ 参见 Joseph Nevins, *Operation Gatekeeper: The Rise of the "Illegal Alie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U. S.-Mexico Bounda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156.

二、导致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受阻的因素

当代美国外来移民的融入困境,大规模持续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异质性突出的移民,无疑是最为直接、重要的因素。但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也对阻遏当代移民在美国社会的融入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和实践上对多元文化的追求,移民跨国联系的加强,死灰复燃的美国排外主义情绪,以及移民在代际上多处于初代与二代,在经济上多属于美国社会中下层等。

(一)多元文化主义

自殖民时期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社会就已证明其拥有一种引人注目的能力,即吸纳外来移民及其后裔。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移民潮中,由于来自与美国主流文化差异较大的东欧和南欧的移民数量巨大,对美国传统的“盎格鲁归同”这种类似“融冰模式”的融合模式提出了挑战。取而代之的是1908年犹太移民伊斯雷尔·赞格威尔提出的“熔炉论”,这是一种基于平等理念的“融糖”融合模式。^①到二战前后,包括东南欧移民在内的整个欧洲各移民族群基本实现了基于“融糖模式”的融合进程,族群意识走向淡化。不过,这种融合的“融糖模式”在二战后不久便遭到质疑。美国社会学家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其1963年出版的《熔炉之外》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大熔炉并没有发生”。^②这一论点在不到十年时间里便被广泛接受,“白人中心主义”(White centrism)话语成了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词。率先挑战美国主流白人中心主义话语的是非裔美国人。随后爆发了在美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民权运动。该运动取得丰硕成果,但其所导致的激烈反应,也撕裂了美国,尤其是主流白人同少数群体间的关系更趋紧张。

这种分裂促成了美国族群意识的觉醒与族群认同的回归,甚至那些已经融入美国主流白人之中的群体,也重拾本族群的族群认同,有意识地维护、彰显本族群的文化。以致盎格鲁白人也声称他们是族裔群体之一。^③可以说,除保障少数族裔群体的各项立法外,民权运动的最大遗产或许是随之而来的不同族群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疾速兴起。^④而民权运动之后的多元文化主义亦鼓励移民族群维持传统的文化属性,至少不会被强迫融合。

“多元文化主义”一方面承认美国社会多样性的现实,另一方面旨在推进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促成这一目标;它既是对美国社会当时阿尔巴状况的描述,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目标诉求。在“多元文化主义”理念下,各个族群皆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追求该族群感觉最适宜的价值

① 参见 Israel Zangwill, *The Melting Pot; Drama in Four Act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94。

②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M. A: The M. I. T. Press, 1963, p. 290.

③ 参见 Humbert S. Nelli, *From Immigrants to Ethnicity: The Italian Americ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92。

④ “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在美国早已有之,在1915年美国犹太学者霍雷斯·卡伦(Horace Kallen)提出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概念,其内涵与“多元文化主义”有部分相同之处,都强调少数群体的文化,并对“主流中心主义”提出挑战。参见王希:《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塞缪尔·亨廷顿对“多元文化主义”亦做了归纳,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 171。

观念与行为方式。正如内森·格雷泽所言,多元文化主义“拒绝融入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中”。^①“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在美国的流行,为少数族群维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族裔认同提供了一个相对宽容的社会场域。移民长时间持续的跨国参与也逐渐为美国社会所宽容,很多移民及其子女与母国建立了跨国联系。

由于“多元文化主义”尊重和倡导文化的多样性,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融合”理念的污名化。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阿尔巴(Richard Alba)和维克托·尼(Victor Nee)在2003年出版的《重建美国主流》一书中指出,“融合”作为一个关键而抽象的概念,在20世纪晚期受到相当多且尖锐的批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流行使人们认识到,少数族裔的文化具有其自身的价值与生命力。尽管学者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和米尔顿·戈登提出的“融合”基本概念框架,但当代社会学家对传统融合理论的许多固有假设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传统的融合理论是过时的,在意识形态上也是腐朽的,是一种白人中心主义而忽视少数族裔价值观的融合观念。阿尔巴与尼两位学者则争辩说,虽然很多人批评基于民族中心主义的融合解释和规范不无道理,但融合并非毫无意义,不同族裔的融入进程也仍在进行。他们强调,融合的基本原则在理解不同族裔关系方面仍然颇具价值。^②的确,某些层面的“融合”同时获得了融合支持者与反对者的广泛认可。例如语言同化,它有利于职业流动和公共领域的充分参与,对移民及其后裔在美国获得成功至关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绝非美国社会学家亚历杭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鲁本·伦波特(Ruben G. Rumbaut)所称的“减法”语言同化——语言的代际丧失,^③而是在掌握移入国语言的同时,保留母语。阿尔巴和尼为当代美国移民融合的辩护之声,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而几乎与他们著作同时出版的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一书,因指出当代美国移民融入受阻导致美国特性危机而一时洛阳纸贵。从整体社会观念来看,“融合”也在逐渐走向衰微,而对族裔文化的尊重与包容成为美国社会当时的一种新方向。总体而言,在多元文化主义理念下,移民族裔存在排斥融合的动机,而缺乏融合的动力,甚至有意维护其母国的传统文化。

(二) 跨国主义

尽管在相当长时间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这一术语并不存在,但移民史家广泛地记载了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移民群体持久的双民族社会经济和政治参与及文化认同等跨国现象。^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末以来所理解的“跨国主义”内涵,契合以往的历史。^⑤跨国现象在国际移民史上并非新生事物,但当代的移民跨国主义自然不是对旧有跨国关联的复制,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有了新的特点。

当代移民的跨国关联,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历史上的跨国现象不同。首先,跨国移民的规模远超以往移民,且有循环移民和回迁的特点。20世纪中期之前的国际移民,无论是横跨大西

① 参见 Nathan Glazer, *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0。

② 参见 Richard Alba and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pp. 7, 9。

③ 参见 Alejandro Portes and Ruben G.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209—221。

④ 参见 Mark Wyman, *Round-Trip to America: The Immigrants Return to Europe, 1880—193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⑤ 关于“跨国主义”的内涵与意义,参见 Steven Vertovec,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丁月牙:《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 潮龙起:《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洋,还是穿越太平洋,移民的行程基本上是单程的,从一个久居的空间迁移至另一个空间久居。其次,早期移民更多的是一种永久性移民,不可逆转地分割以往传统生活而进入全新的移民生活。而20世纪末以来很多移民的生活,跨越母国与居住国社会。无论是临时移民还是永久移民,都与其母国社会保持着密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从而形成新的跨国空间。最后,这种新跨国空间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复杂的,在过去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新政治领域。这种新政治领域,由移居国外的移民同母国与居住国共同创建。

跨国联系的加强,是美国当代移民的显著特征之一。美国当代外来移民跨国联系的加强,其促成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由于通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时间和空间相对得到极大压缩,移民所维持的跨国联系比过去更加紧密。第二,这些联系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多样化。当代移民本身在地区起源、种族认同、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更加多样化;在东道国社会,移民的法律地位不同,在经济上所处的层级也有差别,对主流社会的文化适应模式各异。第三,总体而言,当代美国的公共话语和司法体系对多样性的容忍度比过去要大得多。移民及其后裔可以公开表达他们与母国的关联与认同,而不必过于担心来自东道国的排斥,甚至暴力。

以亚洲的印度移民为例,在1990年的人口普查中,有45万名外国出生的印度人在20世纪80年代移民美国,其中超过60%拥有大学学位,65%从事中产阶层职业。^①由于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对母国文化、情感的牵绊,再加上愈发便捷的通信技术,使印度中产阶层移民密切关注并参与母国事务。在强调家庭义务和对国家忠诚的传统印度文化中,在美国的移民通过汇款与及时通信联系来保持跨国家庭的联系,并通过投资来支援母国建设。而母国的相关政策,也有利于美国印度移民群体维系与母国的关系。印度的中产阶级移民在母国政治上也有积极参与,他们在互联网上越来越多地讨论母国的政治事务,其相关组织多次向印度政府申请双重国籍,以便他们能直接参与印度政治。

资本的跨国流动也会促进跨国移民。印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促进这种跨国关系,为美国印度移民投资其母国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印度政府还于1999年推出“印度人血统卡”(Persons of Indian Origin Card),持有此卡者可在没有签证和财产证明的情况下进入印度。这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的印度移民对印度经济和情感的参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的驱使下,以及对“印度性”(Indianness)的情感牵绊,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与印度相关的跨国活动中,而这种跨国活动反过来又维持了他们的印度人身份认同。然而,移民的跨国联系与融入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紧张(tension)。美国化的印度中产阶级移民及其后裔,在母国往往会遭遇负面评论,从而使处于两种文化因子夹缝中的移民陷入两难之境。他们一方面在美国遭遇种族歧视与排斥,另一方面也遭受母国人们的怀疑与不理解。他们对“多元文化”的支持与其说是为了维护其传统文化,不如说更多的是希望能在美国获得平等对待和权利实践。

融合与持续跨国身份和跨国参与的共存,经常导致当代美国移民及其子女生活的紧张。对于美国非白人移民群体的成员来说,由于融合和种族融入对东道国社会产生的矛盾性影响,造成的不适与痛苦非常常见。对于这些移民及其后代来说,融入东道国社会也意味着失去了

^① 参见 Ewa Morawska, "Immigrant Transnationalism and Assimilation: A Variety of Combinations and the Analytic Strategy it Suggests," in Christian Joppke and Ewa Morawska, eds., *Toward Assimilation and Citizenship: Immigrants in Liberal Nation-States*, p. 136.

与非白人种族或非西方国家相关的身份。移民接受国对双重国籍的默认容忍,鼓励移民或族裔参与母国的事务,并随时间的推移对移入国社会和维系跨国关联做出贡献。移民在向美国社会上层流动的过程中,保持其处于族裔边界内,以便更好地获得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移民的孩子们保留了族裔身份认同与跨国联系,作为抵御美国社会歧视的一种手段。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跨国共同体”(transnational community)。“跨国共同体”基于一种不同于公民身份的“归属感”。它关乎设定一种先于而且超越公民身份的认同,一种不受国界限制的共同体意识。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依赖这种“跨国共同体”维系和加强了与原籍共同体的联络,即便他们获得了合法、稳定和永久的居留权。对他们而言,在美国可能的融合,并不意味着断绝与原籍共同体的关系,因为他们对原有共同体的依附感比由政治建构的依附感更深刻。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当代移民在美国的融合,只是为了更好地捍卫和维系这些跨国共同体的手段。

(三)排外主义

排外主义,也是导致当代移民融入受阻的重要原因。尽管当代美国的排外主义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在其名著《国土上的陌生人》中所说的排外主义核心是种族主义已有所不同,但基于种族的排外仍在发挥作用。排外主义的其他方面也大同小异:排外主义者往往指责移民抢去了本国人的就业机会,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困、犯罪与大都市的隔都化;移民使美国在种族上、文化上、生活方式上更加趋向分散而不是“合而为一”。^①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排外主义,其排斥外来移民的话语大多仍是19世纪中后期排华以来的相关排外话语。这种排外话语将外来移民建构为种族与文化的“他者”,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威胁,降低了美国人的生活标准,加重了美国的财政与福利负担等。移民跨国共同体的形成,是以开放和流动为前提,而福利体系则是封闭内向的,是对特定共同体内成员的保护。移民的介入是对特定共同体稳定性及其成员的双重挑战。^②不过,当代美国的排外主义,也有其特点。越来越多的亚洲移民和拉丁美洲移民进入美国,催生一种新的、没有基于种族分类的种族主义。前文已提及,在当代美国,作为一种针对美国排外和种族歧视的自我防御策略,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及其后裔,相较于其先辈更多地倾向于认同他们的国家起源。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可以挑战自己的困境,无论是作为一个移民群体,还是与本土的非白人团结一致,在居住国的意识形态和法律政策下,争取为所有公民提供公平和平等的机会。

(四)代际与阶层

移民的融合除受特定族群的影响外,还与其所处代际联系紧密。一般而言,在同一移民族群中,随着移民族裔代际递增,其融合的程度愈深。然而拉美裔和亚裔二代移民,在美国的融合进程则相对有限。由于当代美国移民基本是1965年之后来到美国,其构成无疑主要是来自拉美洲和亚洲的初代和第二代移民。初代移民基本上维系着母国的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主要使用母语,族际通婚率极低。而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出生公民权”条款,移民二代出生时即被授予美国公民身份。由于背景不同,文化各异,第二代移民融入社会的过程也具有很大的多样性,但总体融入进程缓慢。他们大部分使用双语,其中近70%在家仍使用母语。

^① 参见 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31.

^② 参见 Antoine Pécoud and Paul de Guchteneire, "Introduction: the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scenario," in Antoine Pécoud and Paul de Guchteneire, eds.,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Essays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Berghahn Books, 2007, p. 17.

拉美移民由于人口基数大,生育率高,其第二代移民在美国的增速显著。^①与初代拉丁移民相比,第二代拉美裔移民的异族通婚率略有提升,但如前文已提及,这种通婚率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跨族裔婚姻比率,是衡量移民族群融入美国社会程度的绝佳尺度。

亚裔二代移民的融合同样是多层次的,其中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与其他种族的第二代移民相比,亚裔移民二代上升为中产阶级的可能性更大。其中部分选择在郊区定居,但这并不意味着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如洛杉矶这类大都市的郊区也逐渐走向“隔都化”(ghettoized),形成郊区华人“隔都”等。与拉美裔移民一样,亚裔二代移民往往会说两种语言,对家庭和传统保持一种情感上的依恋。亚裔二代对种族和族裔问题颇为敏感,对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刻板印象和种族歧视难以容忍。^②这与亚裔在美国历史上所经历的种族主义歧视和排斥有关,也推动他们维系亚裔认同与跨国关联。

移民所处经济阶层的高低与其融合顺利与否也存在密切联系。移民家庭的文化氛围和经济条件直接影响到后代的学历教育和劳动技能的养成。如果移民家庭经济较差,无法有效利用教育资源,则极有可能出现世代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状态,进而被迫与美国主流社会隔离开来。处于经济阶梯底层的移民,在融合的渠道上不如中上层那般多样,反而更多地拥抱母国文化和社区组织。当代的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美国社会底层。^③经济条件的限制,使得这些移民很难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融入进程自然也就阻力重重。

三、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受阻的影响

美国当代大规模外来移民及其融入的受阻,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其中既有机遇,更有挑战。大规模移民及其融入缓慢,加深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是刺激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不同族裔间文化的接触推动了美利坚文明的发展与成熟。文化多样性既是社会活力的一种表现,也是其保障,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促了美国在世界经济、科技、教育上的竞争力与领先地位。但当代美国社会多样性的发展也为国家带来了诸多挑战和问题。这些影响无疑改变着美国的现实,并对其未来造成深远影响。

美国移民融入受阻,其带来的机遇在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的,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挑战则迫在眉睫,且非常巨大,同时也更易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这种挑战首先是族裔间冲突的加剧。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便是这种冲突的极端表现。在这一美国当代历史上最为恶劣的种族暴动中,52名鲜活的生命丧生,2383人受伤,造成大约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有超过1.2万人被逮捕。^④通过对暴动受害者的初步观察,不难发现其中的反移民种族冲突色彩。洛杉矶的四天暴动,是种族与阶级关系紧张,以及排外情绪糅合在一起的结果。在暴动中,移民成了美国社会底层失败者的替罪羔羊。很多评论家也认为,洛杉矶暴动是美国迅速崛

① 参见 Roger Waldinger and Cynthia Feliciano, "Will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experience 'downward assimil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re-assesse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7, No. 3, 2004。

② 参见 Min Zhou and Yang Xiong, "The multifaceted American experiences of the children of Asian immigrants: Lessons for segmented assimil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8, No. 6, 2005。

③ 参见梁茂信:《现代欧美移民与民族多元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42—443页。

④ 参见 George J. Sanchez, "Face the Nation: Race, Im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Nativism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 4, 1997。

起的排外主义的极端实践与表达,标志着当代美国“种族化排外主义的兴起”。^①很明显,这次暴动的显著目标是洛杉矶中南部的韩国商人。1990年,在洛杉矶生活的韩裔达到14.5万人,比1980年增加142%,而在1970年时,这一数字仅为9000人。^②由于当代从亚洲和拉丁美洲进入美国的新移民无法逃离自己的种族背景,这种新的排外主义情绪和暴力,则会在某些时候在美国的政治与社会中有所反应。

其次是非法移民的膨胀。尽管美国立法对墨西哥移民有诸多限制,但由于美墨之间绵延数千公里的边界线,使得越过美墨边界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与日俱增。美国政府耗巨资修建的隔离墙,也未从根本上减缓以墨西哥非法移民为代表的拉美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美国边境巡逻队抓获的企图非法入境者,20世纪60年代有160万人,80年代猛增到1190万人,90年代为1290万人。至于成功的非法入境者,自然难以计数,据美国移民与归化局估计,平均每年有35万非法移民成功翻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③美国华人非法移民尽管数量也颇为可观,但同墨西哥非法移民仍不可同日而语。不夸张地说,当前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墨西哥非法移民问题。非法移民具有连锁式移民的特征。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不但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中占据多数,对美国的冲击也更甚。同华人非法移民一样,墨西哥非法移民普遍工作技能缺乏,英语水平不足,只能局限于墨西哥裔聚居区挣扎求生,并在短期内给美国福利财政支出带来不小负担。美国非法移民聚集区,通常成为贫困、娼妓、贩毒、暴力犯罪的多发地。美国主流社会对其负面印象,亦会波及同族群的合法居民,并可能引发不同族群间的仇恨和冲突。

再次,由于种族冲突与非法移民的激增,对安全问题的忧虑致使美国进一步加强边境管制与移民控制。主权国家常以国家利益为由,采取一些单边举措,美国对移民的管制亦是如此。近年来,美国社会因移民管制引发了一系列论辩,其结果是高墙和钢铁围栏得以沿着美墨边界建立。越来越多的巡逻人员依靠先进的技术装备,包括高强照明设备、体热和移动检测传感器,以及视频监控设备,来探寻穿越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④2006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批准了一项耗资高达70亿美元的彻底防御美墨边境的计划。^⑤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移民进入美国。但现代发达的交通与通讯技术又为移民翻越国界进入美国提供了便利。从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国界并没有实现有效管理,非法移民也未能得到有力控制。非法移民的持久性及其庞大的规模表明,即使复杂的国界控制方法也无法成功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国家管制对美国这一自诩为自由、民主的国家而言显得尤为困难。美国同墨西哥之间的国界已日益强化。国家主权衰落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遭遇挑战。事实上不仅仅是美国,整个西方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国界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因为自

① 参见 Janet L. Abu-Lughod, *Race, Space, and Riots in Chicago*,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45—246; George J. Sánchez, “Face the Nation: Race, Im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Nativism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 4, 1997。

② 参见 George J. Sanchez, “Face the Nation: Race, Im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Nativism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1, No. 4, 1997。

③ 参见 Barry Edmonston and Jeffrey S. Passel, “Ethnic Demography: U. S. Immigration and Ethnic Variations,” in Edmonston and Paddell, eds., *Immigration and Ethnicity: The Integration of America's Newest Arrivals*, Washington, D. C., Urban Institute Press, 1994, p. 8。

④ 参见 Antoine Pécoud and Paul de Guchteneire, “Introduction: the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scenario,” in Antoine Pécoud and Paul de Guchteneire, eds.,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Essays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p. 3。

⑤ 参见 Philip J. LaVelle, “Bush Signs Bill to Beef Up Border Security,” *San Diego Union-Tribune*, October 5, 2006。

“9·11”事件以来,西方世界普遍认为,存在漏洞的国界为恐怖分子的活动提供了便利。美国对国界管制的加强,未能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而只是增加了他们进入美国的难度。非法移民越境的过程变得更加危机四伏,他们成了不科学移民管制举措的主要受害者。很多移民在非法越境的途中不幸丧命。^① 2001年5月23日,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中,发现了14具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尸体。^② 据保守估计,平均每天至少有一位非法移民因高温、脱水、中暑或溺水而死于美墨边境。^③ 同时,这种国界管制也间接激化了美国的种族主义。美墨边界高耸的隔离墙,在美国民众中滋生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隔离墙另一侧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并对已经在美国的合法移民或归化入美国国籍者的正当权利造成影响。

又次,美国社会多样性的快速发育,也促进了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回潮与传统融合模式的回归。美国学术界不乏阐释针对移民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回潮,并最终导致美国移民政策的收紧趋势,以及不同族裔间紧张关系的相关论著。其中,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出版《我们是谁?》一书,更是将美国的同质化问题,以及美国所面临的来自拉美移民与文化的威胁直接推到了公众面前。而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似乎印证了保守主义在美国现实社会的某种胜利。近20年在美国出现了德国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乔帕克(Christian Joppke)等所说的“融合的回归”。^④ 对于美国的融合主义者来说,所谓“融合的回归”事实上是回归到融合的“融冰模式”中,即外来移民抛弃自身传统文化,放弃对母国的认同,完全接受美国主流文化,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移民母国的发展,以及美国在世界地位的相对衰落,尽管有美国主流社会的各种努力,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信心仍然乏力。移民融合模式的回归,也并不意味当代美国移民及其后裔会经历与过去相似的融合过程,而是提醒学者们在意识到当代美国移民及其融入进程特殊性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与以往美国移民及其融合的相似性与关联。

最后,2001年“9·11”这一突发事件,冲击美国人的安全感与威胁观念,促使移民问题与国家安全更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⑥ 该事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回潮,以及针对移民向传统融合模式的回归。这一点,可从“9·11”事件前后美国使用的教科书关于“多元文化主义”态度的转变中窥视一斑。根据美国学者理查德·威卢克斯(Rachel Hutchins-Viroux)的研究,在1997年的美国教科书中,普遍承认多样化的美国,多样性被认为是美国的特性之一,学生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和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等主流学术机构所倡导的多元

① 参见“Illegal Immigrant Death Rate Rises Sharply in Barren Areas,” *New York Times*, August 6, 2002。

② 参见 Hilary Cunningham,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Sovereignities in Transition: Charting New Interfaces of Power at the U. S. -Mexico Border,” *Anthropologica*, Vol. 44, No. 2, 2002。

③ 参见 Josiah McC. Heyman, “‘Illegality’ and the U. S. -Mexico Border: How It Is Produced and Resisted,” in Cecilia Menjivar and Daniel Kanstroom, eds., *Constructing Immigrant “Illegality”: Critiques, Experiences, and Respon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13; Antoine Pécoud and Paul de Guchteneire, “Introduction: the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Scenario,” in Antoine Pécoud and Paul de Guchteneire eds., *Migration Without Borders, Essays on the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p. 4。

④ 参见 Christian Joppke and Ewa Morawska, “Integrating Immigrants in Liberal Nation-Stat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Christian Joppke and Ewa Morawska, eds., *Toward Assimilation and Citizenship*, p. 6。

⑤ 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p. xvii。

⑥ 参见 Catherine Dauvergne, *Making People Illegal: What Globalization Means for Migration and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95。

文化主义史学,致力于从更加多元的层面来解释美国历史的进程。这种观念使得美国历史中一些先前被忽视的层面和群体,被写入主流的历史教科书中。比如非裔美国人在奴隶制下所遭受的苦难,美国历史中的排华及其暴力,以及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拘留等。^①然而,“9·11”事件之后,美国社会急剧转向保守。保守主义者反感日益多样的美国文化,抨击多元文化主义,甚至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对恐怖主义的妥协。一些坚定的保守人士更是认为,应该强调传统的美国爱国主义,以及基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的传统移民族裔融合模式。美国的教科书也比以往更为注重颂扬美国主流价值观及其社会的优越性。^②

四、结 语

概言之,当代美国外来移民自然融合的受阻,是移民自身特征与美国社会环境因素综合的结果。以亚洲和拉丁美洲为代表的持续大规模移民所推动的文化多样性的发育,使美国在种族、文化和语言等方面多样性进一步加强;“多元文化主义”不但适时地保护了这种多样性,并鼓励移民族群维系其传统文化特性;持续加强的跨国联系,使得移民在移入地与母国之间更加进退有据,进而主动保持其对母国的认同;而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与排外主义的加强,再加上大规模非法移民以及移民贫困的大规模长期存在与代际传播,致使移民群体越来越趋向于族群聚居,逐渐形成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孤岛”。这些因素彼此强化,相互促进,导致当代美国外来移民既无融合的内在动力,也缺乏融合的外部压力,从而塑造了当前美国社会多元的族群格局与日趋紧张的族际关系。

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由于种族和文化的隔离,阻碍了他们遵循以往移民传统的“融冰”或“融糖”融合模式,而是将融合的“扩散模式”这一长期居于边缘的模式,推向美国移民融合的中心。在这种融合模式下,移民族裔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进程极为缓慢,美国社会也因而多少具有了一些移民迁出国的文化特征。譬如,洛杉矶东部是墨西哥裔美国人居住最为集中的区域,其居民大多为墨西哥移民及其后裔,西班牙语也是这一区域使用的主导语言,该区域成为美国墨西哥人的聚居区和文化“飞地”(enclave);在其他许多地区,类似相对完整保存母国文化的各种族裔聚居区也并不鲜见。以东洛杉矶墨西哥人社区为代表的移民族裔聚居区,便成了美国移民城市中的一种常见现象。

〔责任编辑 马俊毅〕

① 参见 Rachel Hutchins-Viroux, “Multiculturalism in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 before and after 9/11,” in Derek Rubin and Jaap Verheul, eds., *American Multiculturalism after 9/11: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33—134.

② 参见 Diane Ravitch, “Now is the Time to Teach Democracy,” *Education Week*, 17 October 2001, <http://www.brookings.edu/>;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2004, p. xvii.

民族地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 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分析^{*}

丁 赛 王国洪 王经绫 冯 伊

民族地区县域文旅产业不仅是县域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基层,与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本文基于民族地区71个县(市)/旗文旅产业问卷调查,借鉴了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专家打分法和聚类分析法构建了民族地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是从经济发展、道路交通状况、文旅产业现状、文旅产业资源和县级政府扶持五个维度测量的综合性指数,同时还包括了26个二级指标,109个三级指标,其目的是对民族地区县域文旅产业发展现状进行量化评估,以揭示目前民族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并为今后文旅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民族地区 文旅产业 指标体系 县域经济

作者丁赛,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邮编100081。王国洪,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地址:北京市,邮编102617。王经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经济研究室副教授。冯伊,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系硕士研究生。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6号楼,邮编10008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and 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①近14亿的人口规模和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使得我国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和独特优势。文化产业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越来越重要,不仅是因为文化产业自身可以直接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还可以渗透到其他产业,融合形成很多新的产业形态,创造出更多高附加值的新产品,因而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复兴地方经济和增强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文化产业逐步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亮点,文化产业的年增速远高于GDP的平均年增速。^②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创新课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组在方勇研究员主持下多次讨论后成稿,丁赛执笔,王国洪负责指标体系的测算,王经绫和冯伊进行了数据整理,课题组其他成员不仅参加了论文讨论,还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

② 参见范周主编、齐骥执行主编:《中国文化产业年度报告2017》,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